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1.6%提升到39.8%，电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全球第一，数字产业化基础更加坚实，产业数字化步伐持续加快，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持续蔓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本期推出“数字经济”专题，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部署，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数字经济

- 02 如何解读中央关于数字经济的有关意见
- 04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如何有效融合？
- 06 平台经济时代，劳动何以体面？
- 08 白津夫：发展数字经济体系的趋势和路径

视点关注

- 15 阅读在个体人生、民族文化中占据着什么地位？

悦读时光

- 封三 现代性的另一面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封面书法：臧 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祁 杰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62528568

邮 箱：1015873743@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2年8月31日

印刷数量：200本

如何解读中央关于数字经济的有关意见

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中央网信办等20部门组成的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推进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统筹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这是继数字经济政策密集落地之后,政策层在组织、实践层面对数字经济的重要布局,数字经济有望加速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刚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方案,从数据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方面布局。中央此举意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带动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产业发展进一步积累资源和动能。

这些有关数字经济的新变化,意味着数字经济方面规则的确立和完善。

如何解读中央关于数字经济的有关意见?

从内容看,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明确数据权属和分类,二是构建数据交易的机制体制。数据权属的明确,权责进一步清晰,实际上是为数据交易奠定法律基础。当然,新的方案还未就此进行明确,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权属清晰的体制,从而使相应的数据交易得以进行。尽管目前上海、北京、海南等地方都开始尝试建立数据交易所,尝试数据交易。不过,从规模和交易频次看,仍然属于初始的尝试阶段。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数据资源开发和应用的重心,将从消费端转向生产端,未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重心,都会从面向终端消费者的数字化,转为面向生产的数字化。



新的构想尽管为数据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并不意味着对数据产业或数字经济发展就能形成短期推动。未来依靠数字技术来产生数据,而不是把数据变现,在其它领域同样如此。此前靠资本和市场扩张收获“流量”的模式,将面临越来越高的商业成本和监管壁垒。

目前,从数字经济在国内的发展趋势看,在互联网平台受到整顿,国内5G网络已度过大规模普及建设阶段后,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动力将有所减弱。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速增长,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增速较上一年下滑了5.9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值得关注。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预计增长至42.4万亿元,占比为37.06%,占比较上年略有下滑。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低于美国、德国、英国21.4个百分点,低于全球平均值5.1个百分点。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曾经指出,数字经济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数据资源的权属问题。(《数据权属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每日金融」,2021/4/22)目前受到约束的互联网平台所秉承的流量经济,实际上争议的核心就是数据使用权问题。以互联网消费为代表的现有互联网平台经济中,在市场扩张遇到边界,数据获取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互联网平台依靠自身积累的客户数据,正寻求在消费、金融领域进行变现。这对目前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带来很大冲击,也是互联网平台被整顿的重要根源。

因此,如安邦智库所言,明确和解决数据资源权属问题,可说是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就数据资源而言,尽管在医疗、金融领域仍有一些发展空间,但在反垄断制度日益完善,相关领域监管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流量经济受到约束和制约,意味着目前以消费者数据为基础的大量数据资源,在消费端获得应用和开发的空間将受到约束。

从整体趋势看,在互联网平台受到约束、流量经济遇到增量瓶颈的情况下,以终端数字消费为主的数字产业化发展,在经历快速增长的阶段后,正面临发展和转型的瓶颈。

对数据产业而言

一方面,加强监管意味着以消费者数据为主的大数据资源,还面临进一步开发和“导流”的制度性障碍;

另一方面,物联网、产业互联网等生产端数字产业化发展,不仅面临数字基础设施不足的障碍,其产业化发展本身仍需要技术上的突破。

此外,生产端还面临缺乏大量生产数据的基本障碍。因而,数字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空间中,生产端大量数据需求是目前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建立数据交易机制的核心动力。

从目前数据产业本身看,在“东数西算”的战略之下,中西部地区正在搭建数据中心,以满足目前和未来大量数据存储的需要。但这些数据的应用,数据资源的开发,不仅面临制度上的基础问题,更缺乏数据应用领域的开发。



在以大数据产业发展著称的贵阳,目前贵阳的大数据产业主要集中于存储,扎堆的大数据投资项目主要是数据中心,即“机房经济”。要想挖掘数据资源,不仅需要实现数据的积累和挖掘,更需要技术和产业的支撑,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数据的升值。但是,实体经济不强、缺乏数据开发能力,已成为贵阳发展的最大短板,这使得其数据产业总体处于价值链层级中低端,核心竞争力较弱。因此,各地大数据产业如果希望进一步发挥作用,仍需要基础产业提升和融合发展。未来数据产业发展与否,在于大量生产数据的积累、应用和开发,这也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重心,开始从消费端向生产端转移。

中央深改委有关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构想,意味着将解决数据权属的模糊地带,进一步实现数据的可交易、可转移。这为数据大规模开发提供了制度和市场基础。未来的趋势,在消费端数字产业化告一段落后,数字经济的增长重心将转向生产端。

(安邦智库 2022-07-27)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如何有效融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企业紧扣这五大发展理念，大力推进融合发展，创新企业产销模式，保障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绿色共享开放发展，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最近发布了《“十四五”期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报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优势，可以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帮助中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也会实现提质增效发展。

创新为要，以产销精准匹配适应经济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国内越来越多用户的需求趋向个性化、多样化，并呼唤生产更便捷灵活的平台，巧妙对接供求两端，发挥最优效能。在当前消费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中国，借助数字经济技术与平台连接企业和用户，不少实体经济企业铸就了一条弯道超车之路。

优衣库、丝芙兰、绫致集团的服装店员们，通过

会员 H5、线上商城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用线下“扫码购”等形式打通库存系统，巧妙连接线上运营与线下客户，通过企业微信、微信群等工具持续运营会员，在服装行业实体店整体经营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依然逆势增长。2020 年初的疫情防控期间，西贝莜面村更是在门店线下流量骤降为零的情况下，积极布局线上运营，通过企业微信与 9 万多名顾客紧密连接，提供线上送餐和食材订购服务，保证了企业现金流与后期存续。

而对于占实体经济大头的中国制造业来说，创新产销模式，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不仅是一道应答题，更是一道必答题：一边是发达的消费互联网，一边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如何优势互补，再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北京日报撰文表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从流通到制造。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等领域，以面向个体为主。或者说，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下一步，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在这方面，玲珑轮胎与腾讯作出了积极探索。两家企业合作打造了全球首个轮胎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打通了玲珑轮胎多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孤岛，

数字经济

形成了统一的用户画像,并根据渠道、门店的销售量和库存,优化排产计划,最终实现疫情防控期间销售逆势增长 50%。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三希就此表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直接体现是“产业数字化”,在用户端,有助于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同时构建网络,实现价值共创;在供给侧,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生产效率,增强组织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并有助于促进销售渠道的变革,扩大市场需求。

协调发展, 确保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新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非常注重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当前,国内农业产业链稳定发展依然存在品牌发育不足、附加链条较短以及种子造假等难题。基于此,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附加值,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保障中国人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题中之义。

实现农业品牌化发展和延长附加链条,精准溯源与有效保护是关键。2019年,农业农村部还启动实施了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此后针对地标农产品品牌建设进行了多项战略性部署与推进。

而借助自身连接能力,腾讯推出的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安心平台,就在农产品溯源、区块链技术、农产品品牌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启动的“安心农产品计划”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助力行动,为其在农产品溯源、行业标准制定、品牌营销及保护、品牌形象设计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扶持。

近些年来,我国农业品牌也跑出了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等名品,却因为仿冒品的泛滥导致了消费者的不信任。针对农业品牌被仿冒侵权事件的高发,腾讯安心平台也致力于打造流量防刷模型,强化防伪溯源能力,助力众多农业企业建设了完整的数字化溯源系统:依托一物一码,平台农产品每个流通环节都通过二维码进行商品数据共建,并通过区块

链技术保障这些数据的不可篡改和隐私保护。这些举措无疑对实现农业品牌化发展、保障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有重要意义。

数实融合, 铺就绿色、开放与共享之路

当前,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已经成为国内的高度共识。电动化与数字化也成为我国新能源全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而在这些领域,数实融合有助于发挥最大效能。

2021年7月,宁德时代就与腾讯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将共建“宁德时代-腾讯云 AI 联合创新基地”,打造体系化全流程 AI 生产力,重点对新能源质检领域一系列世界级难题进行 AI 技术攻关。

这只是工业互联网与数实融合落地绿色智能制造的一次试验,也是新发展理念里开放与共享精神的落实。工业互联网的产业数字化进程,不仅会带来数字经济企业与制造企业的合作碰撞,也有助于企业数字能力普惠化提升。

在开放与共享精神的引领下,腾讯积极联合多方参与者,共同打造多地工业互联网基地,助力中小企业建设“数字化底座”。2021年4月,腾讯云(重庆)工业互联网基地已在两江新区落成,其将数字化基础设施与重庆本土制造业优势结合,不断助力汽车、电子、装备等重庆支柱产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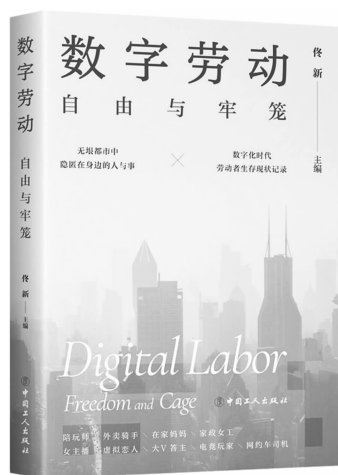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对于中小科技企业,靠自身力量实现数字化转型难度很大,应该发挥如腾讯等科技龙头“数字连接器”的作用,让规模不那么庞大、资本不那么充裕的“大多数”也能切实地感受到数字化变革的动能。

关于数实融合,过去几年,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多次提出,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去年,他表示,“数实融合”需要兴实业,做实事,靠实干;要把科学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下转第 14 页)

平台经济时代,劳动何以体面?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平台型企业已经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与经济创新的动力,孕育出大量形态各异的新型劳动形式,它们广泛存在于快递、外卖、出行、保洁、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领域。2020年,我国包括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滴滴司机、家政人员和电商主播等在内的平台劳动者人数达到2亿,仅“滴滴出行”平台就创造了1360万个就业岗位。有专家预测,到2025年,4亿左右的中国劳动者将通过平台经济解决生计问题。

在平台经济中,这一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的就业方式是怎样的?与传统用工方式相比,平台用工方式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是否随着企业用工方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平台劳动者又是如何艰难地兼顾这种“非标准”工作与遭到“挤压”的日常生活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和她的研究团队成员在《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研究。作为“讲好平台劳动者故事”的观察者、记录者和叙述者,佟新教授研究团队通过聚焦平台劳动者工作和生计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对这些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劳动伦理、劳动保障等诸多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展开了深入剖析,进而揭示出上述数字化转型过程与其背后复杂社会结构之间的勾连关系。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一书批判性地反思了这一时代人们的精神与情感世界及其变迁过程。



《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佟新主编

一、平台经济中技术的双重属性与劳动者的赋权/负权

不可否认,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技术赋权是动态交织的。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选择和多元化的收入渠道,且他们的工作时间变得更自主,工作地点也更灵活。不仅如此,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推进产业升级,以及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等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卢江和刘慧慧两位学者在分析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时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中国,大量劳动力在平台上实现了充分就业,这不仅有助于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生产资料持续优化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更是明确提出了“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总要求,并将此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任务,写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之中。

但另一方面,诚如学者冯建三教授所述,数字技术在带给我们巨大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一种“野蛮暴力”的现实。平台企业通过数字技术不仅实现了对平台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数据化、系统化和非人格化管理,而且通过算法控制、游戏化激励机制、消费者评价机制等多样化的控制手段,对他们实施全面且严密的控制。这些劳动控制方式与传统劳动中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和结构控制方式相比,更具隐蔽性。此外,尽管平台劳动者拥有了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以及更弹性化的工作组织,但灵活的就业方式也意味着他们很少与平台企业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导致他们的职业身份变得越发不稳定,在很多情况下,劳动权益也较难得到有效保障——这也是《数字劳动》一书反复提示我们需要警醒的。

对于平台劳动者而言,原本附着于“雇佣劳动”身份的劳动权益不断被稀释、规避和“悬空”,他们大多陷入“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劳动保障”的“三无”窘境。佟新教授在讨论数字劳动的自由、异化与共享问题时,使用了“纯劳动”这个概念来对上述现象进行凝练与阐述。在她看来,平台提供的同城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微商等各类工作是“纯市场”上“纯劳动”的商品交易,它们不仅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安全排除在外,更是将劳动者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使他们成为“最原始的”“纯粹的”商品化的劳动力,于是越来越多的平台劳动者对自身的未来充满了强烈的不确定感。而随着平台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种不稳定平台劳动者的数量将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发现,平台企业的垄断程度同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劳动条件的人道主义程度等是成反比的。

二、体面劳动: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具体意涵

有学者认为,数字劳动者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是他们正在遭遇“体面劳动赤字”的集中表现。体

面劳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体面劳动议程》(Decent Work? Agenda)就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体面劳动,是指在自由、平等、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能够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报酬和充分的社会保障、保护他们基本权益,以及促进良好社会对话的劳动。因此,为了保证“体面劳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全世界必须从整体上平衡而统一地推进“创造就业”“保障工作中的权利”“扩大社会保护”“推进社会对话与矛盾化解”这四个核心目标的实现。2015年,联合国大会更是将“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写入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我国,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实现更多劳动者的体面劳动是提升我国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应尽之责。由此可见,体面劳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者的普遍需求。

展开来说,体面劳动有三重具体意涵。首先,体面劳动以尊重劳动者的劳动为本质要求,强调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获得尊严和家庭福祉的源泉,同时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其次,体面劳动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根本目的,主要包括依法取得相应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以及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等。最后,体面劳动以消除异化劳动为实现途径。消除异化劳动有助于劳动者实现自身的目的及价值,同时也是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以及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三、平台经济中体面劳动的全面实现

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体面劳动具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又该如何实现“体面的数字劳动”呢?

与传统工作中的体面劳动相似,数字经济时代的体面劳动同样是一种体现人格尊严、强调权益保障和消除异化的劳动。但不同的是,平台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有劳动而无劳动关系”的用工状态。很多平

白津夫：发展数字经济体系的趋势和路径

发展数字经济体系，对于全面提高数字经济的体系化水平，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形成规模和速度优势，需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和更深层次上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一 数字经济发展趋向体系化

从规模扩张到体系优化是经济成长的规律性特征，也是经济形态自我完善的过程。经济规模性增长推动经济体系不断丰富完善，从而持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20多年来，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推动数字经济加速从规模扩张向体系化转型。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进一步放大融合发展效应，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实现经济体系重构和创新。

（一）数字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体系优化转型。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进一步深化。通常认为，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的演进过程。有研究称，数字经济是信息化1.0(信息化)、信息化2.0(网络化)到信息化3.0(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融合)逐次深化的结果。事实上，随着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体系日益完善，数据资源的大规模聚集、深度挖掘和融合运用，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规模化

台劳动者因难以与平台企业确认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成为不受法律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且在维护自身劳动权益方面也往往陷入无法举证的窘境，导致平台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愈发弱势。因此，“体面的数字劳动”首先强调的是明确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平台劳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工作，特别是在工时、工伤、劳动保护、休息休假、解雇、集体协商、社会补偿和社会保险等方面提供法律法规的制度支持，建立起对平台劳动者全面且有效的保护。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202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保护平台用工劳动者权益19条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该《意见》就如何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优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以及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四方面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可落实的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意见》为我们妥善处理好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现实张力——在更好地满足平台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切实维护平台劳动者的权益，实现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实现“体面的数字劳动”不仅是解决劳资矛盾的关键切入点，而且让广大的平台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感，也直接决定着我国平台经济的未来发展。

(2022-08-22 中华读书报)

数字经济

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数字经济作为“特殊的经济形态”一经出现,迅即成为经济热点并呈现规模化发展之势。1996年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在《数据时代的经济学》中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从1998年起美国商务部先后多年出版《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占GDP比重进一步提升。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为5.4%,高于同期全球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其中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增速远超发达国家,2019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4.5%,而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增长7.9%。但从总量看,发达国家远远领先,表明发达国家开始从规模增长向体系优化转型,率先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而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增长的爆发期,整体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同时,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由2018年的40.3%增长至2019年的41.5%。其中发达国家占比达51.3%,发展中国家占比为26.8%。表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形成整体规模优势。

从我国发展实践看,近年来数字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应当说,在数字技术创新支撑下,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形成规模和速度优势。2003年至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并且从2011年以来,数字经济与GDP的增速有扩大之势。按照可比口径,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20.9%,高于同期GDP增速约11.2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为14.2%、2008年为15.2%、2011年为20.3%、2014年为26.1%、2017年为32.9%、2019年为36.2%。增幅持续扩大,反映数字经济规模化的进程加快。然而,2020年以来,其占比和增幅都有所放缓,如2020年增幅为38.6%,比上年仅增长2个多点,这还是疫情期间数字产业超常发展的背景下。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数字经济发展正从快速规模化向体系化转型。

(二)发展数字经济体系渐成重点。如果说2020

年以前是数字经济规模化发展阶段,那么从2021年起,数字经济体系建设将成为重点,并开启全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我国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时期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阶段。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2035年,数字经济将迈向繁荣成熟期。也就是说在未来20多年,数字经济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体系上都将发生新的变化。

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我国通过对统计体系调整,明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中,借鉴经合组织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分类方法,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实,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确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其中数字产业化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5个大类,突出了与国民经济各行业产业深度渗透和广泛融合的特点,勾画了数字经济体系基本框架。

从现实发展看,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指向体系化和规范化,各个国家竞相战略布局发展,加快数字经济体系建设,抢占战略制高点,着力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美国聚焦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构建数据驱动的国家战略体系;创造竞争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制造体系等。

欧盟在2014年就提出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着力培育数据生态体系。从数字单一市场、数据保护、人工智能等领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打造全球数据赋能社会的典范和领导者。

英国以建立数字强国为目标导向,提出连接战略、数字技能与包容性战略、数字经济战略、数字转型战略等战略体系,整体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我国也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整体布局,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全面布局数字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

略,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快速扩散、加速与经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数字经济体系丰富和发展。

但是,从总体看,我国数字经济体系还处于发育过程中,产业体系的基础支撑薄弱,数字产业发展协同性不够,在消费和生产中的应用总体失衡。因此,要适应数字化的新趋向,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体系,全面提升数字经济水平。

二 数字经济体系基本框架

数字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随着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将不断丰富发展数字经济体系。特别是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演进,云、网、端、台融合创新和广泛应用,推动形成数字经济体系基本框架。

从目前数字经济成长阶段看,发展数字经济体系要重点加强以下方面建设。

(一)发展数字技术基础支撑体系。这是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和发展根基。以5G、集成电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演进、群体突破、交叉融合,“技术—产业”交互迭代效应持续增强,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技术产业体系。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化优势明显,但数字技术基础先天不足,既缺少原创技术和基础理论支撑,也缺乏应有的逻辑体系。事实上,至少在互联网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基本上“跟着感觉走”,技术模仿多于创新。比较分析,中美两个数字经济大国在半导体、操作系统、云计算等底层技术和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已是共识。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体系,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首先,要加大关键技术创新力度,聚焦网络信息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重点发力,加快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提升,“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要“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

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夯实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再次,要“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二)健全数据资源体系。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的深度挖掘、广泛运用、合理流动,成为经济体系优化的强大驱动力。我国具有海量数据资源优势,数据的爆发增长、海量集聚蕴藏了巨大的价值,为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要把存量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需要体系化集成、集约化运作。依托数据要素确权、交易单位、定价机制、交易市场、交易监管机构。构建数据权属与收益制度体系、数据定价交易市场体系、数据共享与安全隐私保护体系、数据技术标准与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数据市场开放体系等。要深化大数据应用,打造数据生态圈。

同时,要推进数据专业化开发和规范化应用。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数据收集、传输、存储、计算、分析和应用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行业。通过“数字足迹”“数据洞察”,深度挖掘数据资源,“让数据自己说话”。与之相适应,还要建立起强大的数字储存能力。

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数据资源体系基本建成,利用数据资源推动研发、生产、流通、服务、消费全价值链协同。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数据确权、定价、交易有序开展,加快推进各类体系建设。这将对发展数字产业体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完善平台经济体系。平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发展的神经中枢。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平台体系进一步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数字经济体系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通过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打开产业边界、贯通产业链条、优化关联组织、节约交易成本、提高



整体效能、实现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更加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体系发展完善。进一步推动平台经济发展,加快数字经济体系建设,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要加速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探索构建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等新型架构模式。依托平台优化资源、重构流程,实现平台接单、按工序分解、各工厂协同的共享制造模式,不断开创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其次,要支持消费领域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引导支持平台企业加强数据、产品、内容等资源整合共享,拓展创新、生产、供应链等资源共享空间。

(四)发展数字产业体系。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取决于数字核心产业和数字产业集群聚合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数字产业体系的完善程度。依托数字核心产业加快形成数字产业集群,构建数字产业体系,这是数字经济的主体支撑和活力源泉。

首先,要大力培育发展数字核心产业,进一步提高数字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这是数字产业体系的核心主体,也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2020年,我国数字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8%,支撑了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发展。到 2025 年,数字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将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地区,数字核心产业占比不断提高,如江苏省提出近期目标是数字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10.5%左右;浙江省则提出数字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20%。这在提高数字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也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围绕数字核心产业打造数字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动形成数字产业集群,夯实数字产业体系的根基。同时,还要促进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各领域广泛渗透,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创新,不断丰富数字产业体系。

(五)数字化服务体系。数字化的技术经济特征,进一步放大了数字服务功能,实现服务模式创新,促进形成数字化服务体系。在基础端,通过提供技术基础服务,重构业务流程,强化服务贯通,形成新的产业服务化模式;在平台端,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精准匹配供给需求,更好畅通经济循环;在生产端,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服务链,促进生产服务一体化;在消费端,通过多样化、个性化服务,推动形成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发展数字经济体系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化服务体系,更好发挥数字化服务广覆盖、强渗透优势,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广泛融入生产生活,强化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推动优化数字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电子政务服务水平,不断完善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的利企便民服务体系。总之,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的:“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当然,我国在数字服务应用上还有很大成长空间,与美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美国数字服务应用占比接近 80%,我国则不到 50%;我国数字服务应用增加值低于美国 4.5 万亿元。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数字化服务的发展,着力在数字服务应用上实现新进展,这是发展数字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立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建立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数字经济安全体系。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法治保障的数字治理格局。构建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体系,推动治理创新,提高治理水平,确保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1.明确规则、划出底线,建立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同时,要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2.改进和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3.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一方面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另一方面,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4.以高水平互联互通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发展。通过相互联通破除各种形式的垄断壁垒,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跨界融合,防止为追求过度竞争而损

害市场公平。

(七)优化数字经济生态体系。这是数字经济发展和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生态体系实质上是经济社会数字化过程,是经济社会主体间关联互动、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首先是经济数字化。从消费端到生产端,多领域全覆盖,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渗透水平。目前,数字经济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渗透率为 8.9%、21.0%、40.7%。

其次是社会数字化。从数字社会到数字公民,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从数字政务到数字生活。推动数字化社会全覆盖,深化数字化的认知、理解和共识,形成更广泛的数字文化。培养数字公民,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建设数字政府,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化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率。让全民共建数字社会,共享数字红利。

三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体系的路径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体系有多重路径选择,这其中以下五个“协同推进”具有突出意义,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有效推进发展。

(一)协同推进线上线下互联和现实空间数字空间互通。从目前发展看,线上线下联通快速推进并广泛应用,依托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常态。但是,现实空间和数字空间互通还存在很大的落差,既存在战略认知不足,也缺乏总体规划布局,其整体发展还落后于发达国家。

推进数字经济体系建设既要包括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也要涵盖现实空间数字空间的互联互通,这样才能构建完整的数字经济体系,也才能真正把握数字化大趋势,适应数字技术演进规律,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事实上,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不囿于线上线下互联,开始向现实空间和数字空间互通深化。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元宇宙”概念提出迅即演化为“元

宇宙现象”,各类研究成果频出,一些地方在《政府工作报告》和产业发展规划中也出现元宇宙内容。其实这不能简单认为是炒概念、赶时髦、博眼球,而是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性变化,数字空间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推动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元宇宙”简单说就是平行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是越来越真实的数字空间。从技术维度来解说,就是包括虚拟现实以及结合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各个方面的增强现实。人们通过电脑手机等进行场景融入并体验交流互动,通过融入生产和销售场景,在享受精准服务同时,以数字模拟优化供应链、引导产业链等。在工业元宇宙方面,更是把三维设计、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数据孪生等融为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元宇宙形成与发展,将对传统经济概念、时空概念甚至价值观念带来深刻影响。

实际上,数字化已打开了空间领域,开拓了现实空间和数字空间互通的路径,通过数字空间映射现实空间,不断放大数字空间的优势,并引领现实空间发展。如果说,线上线下结合是现实空间数字化的过程,那么数字空间就是数字化创造的新世界,打开新视域、创建新体系,在数字空间有更加无限可拓展的领域,并且可以直接融入现实空间,重组现实空间结构,提升现实空间发展水平。

所以,要把握数字化的大趋势,主动融入创新发展的大潮之中,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协同推进“两个空间”的互联互通。

(二)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是当前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才能真正释放数字经济的潜能,更好发挥数字化优势,优化现代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当然,协同不是趋同,不能简单化为“齐步走”。

事实上,产业数字化领先增长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常态。有数据表明,2019年全球产业数字化占全球GDP比重为35.0%,在数字经济中占比达到84.3%。我国的情况大体相似,2019年产业数字化占我国GDP比重为29%,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

80.2%。产业数字化为何领先增长?从我国情况看,与产业数字化量大面广,主要是与大量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群体数字化效应有关,也与现行统计分类直接相关。随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实施,将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格局带来一定影响。

当然,协同发展就是要优化增长格局,要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保持合理增长水平。目前,数字产业化明显落后于产业数字化。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7.5万亿元,在GDP中占比7.3%,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20%。而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在GDP中的占比31.2%,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80%。

如果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度长期失衡,既难以形成相互有效支撑,甚至还会形成相互掣肘。从长远发展看,数字产业化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将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源头支撑,因为加快数字产业化发展,有利于产业数字化提升。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作好协同发展这篇大文章。

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要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沿产业链深度融合线上能力和线下生产力,促进产业链各环节互联互通,形成产业链企业间协同互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联动发展。包括深化产业链合作,推动产业体系重构;通过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形成平台化产业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类产业融合,推进“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通过场景化融合,推动形成新业态、新服务。

(三)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形态,是数字文明的核心要义。数字文明区别于工业文明的“竞争”最大化,更加体现“协同”最优化。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促进技术经济多要素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化融合发展的内涵。

首先,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是要防止数字经济“脱实向虚”,即国外学者讲的经济“去物质化”。二是要防止实体经济低水平循环,通过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水平。三是要防止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各行其道,畸轻畸重,甚至相悖发展。既不能简单维持实体经济发展现状,也不能以数字化发展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通过“深度融合”,以发展数字密集型产业为引领,再造经济新形态、重塑发展新优势。

其次,融合发展不是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而是体制性、机制性、生态性和效率性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体系化重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机制化转型: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生态化重组:构建全新产业生态体系;效率化提升:促进产业全面提质增效。再次,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着力发展“新实体经济”。区别于传统实体经济,其特点是以知识、科技、互联网、数据信息、计算能力为核心驱动,从根本上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

(四)协同推进数字化治理和治理数字化。事实上,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同时面临数字化治理和治理数字化问题。前者强调适应数字化发展进行治理创新;后者强调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数字化创新。现在,我们做数字化治理文章多,怎样规范治理平台,整治数字经济秩序等等。但是,治理数字化明显不足,如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和方法,实现精准治理,还需要下很大功夫。

总的原则就是以发展为导向创新治理方式。数字经济没有现成的治理模式,需要全面创新监管理念和治理方式,以适应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要求。要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情况,强化精准化、精细化监管,以利于更好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五)协同推进数字合作和有效竞争。数字经济的核心要义是共生协同,更加要求多领域的联系合作,全方位互联互通,从而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所以,必须加快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目前,数字合作格局尚未有效形成,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有效弥合,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趋势。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体系扩大数字合作机会,创造缩小数字鸿沟的条件。

一是构建数字合作格局。数字化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形成更广泛的数字合作格局。这将从根本上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推进高水平互联互通。推动多领域、全方位合作,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设,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模式,共享发展新机会、合作新红利。

三是增强主体的数字意识和能力。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营造良好数字氛围,提供公平发展机会,让民众广泛参与到数字化中来,合力推进数字化发展。

四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推进“数字丝路”和“丝路电商”加快发展,打通物流堵点,畅通经济循环,从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

当然,合作不能替代竞争,更不能以牺牲竞争为代价。有效竞争是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效率和水平的重要路径。加强数字合作是基于发展的合作,是提升发展活力、共享发展成果的合作,这需要通过有效竞争来实现。

(上接第5页)结合起来,培育中国的创新高地;更要把数字工匠精神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结合起来,树立新时代的“大国工匠精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腾讯有深度的工程师文化,擅长通过数字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用户便利性。而如今腾讯也正通过多种平台渠道赋能实体经济,还可以通过云

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业务能力进一步为实体企业转型数智化提供助力。

“十四五”规划大幕已经开启。面向未来,需要数字平台企业凭借自身技术和安全能力,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做新发展理念数字化探索者,进一步为制造强国战略和数实融合发展提供助力。

(人民政协报 2022-03-01)

阅读在个体人生、民族文化中占据着什么地位？

8月24日，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应邀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上作“中国人的读书——民族精神的接续传承”学习讲座。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王达 摄)

去年，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今年，我们又将迎来党的二十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思考阅读在我们个体人生、民族文化中所占据的地位，所蕴含的价值，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两年前的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国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很有意义”“通过读书学习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运用好读书活动这个载体，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能力素质，并努力带动和影响各界别群众开展读书活

动”。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是十三届全国政协的一项创新性举措，在汪洋主席的大力倡导和悉心指导下开展起来，书香搭台，凝聚共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我从媒体上也了解到，两年来，在全国政协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委员读书活动蓬勃开展，成效显著，并且产生了好的“溢出效应”，不断引领、有力推动了书香社会、学习型社会建设。

今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里说，“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阅读是铭刻在我们这个民族基因里的密码，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险阻而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中国自古便有崇尚读书的传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宋代理学家程颢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不止读书人谈读书，在民间也有许多关于读书的俗语代代流传，深入人心，比如，我们都熟悉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可以说，读书这件事，是从古至今无可辩驳的民族共识，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向来就居于最高位置，对一

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是有重量的,正如同,文学艺术有时比钢铁更强硬。

阅读之重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当时,我也有幸在场,亲耳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读书若渴的故事。他说,“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当时,他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而且一看就“爱不释手”。这让借给他书的人每到赶集的时候就传话让他还书。后来,那个知青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在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到读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书中一位职业革命家为锻炼意志,睡觉时故意睡在钉子床上。他被深深震撼,便也学着书中人物,把褥子拿掉,直接睡土炕。习近平总书记的读书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我们,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年代,书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之重。我还记得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停课,无书可读。父母都被集中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谁家都不敢藏书,我有个任务就是推着小车去卖书。那时,去废品站卖书也要排很长的队。但对少年的我来说,那种排队就是一个偷着抢着读书的好机会。第一次看《静静的顿河》,就是在卖书的行列里。我一边读书,一边盯着前边缓缓移动的队伍,心想收废品的动作慢些再慢些,就让我把这本书读完吧!每次轮到我时,我又推着小车排到队尾,直到前边的人都走尽了,我不得不把那一车书都交给废品站。那次卖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第一次有了特别心疼的感觉。后来,在保定读中学的时候,学校对面有一个造纸厂,造纸厂里有很多回收来准备造纸的堆成山的书。班里一些调皮的男生,经常从窗子里钻进去偷书玩,我知道了,就借来看。那些书里有很多都是世界名著,有的书太好

了,我干脆就不还了,据为己有。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永不能忘的集体记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读大潮。文学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一条宣泄情感、寄托热望的通道。曾经出现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时光。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又十分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可以反复阅读。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中国人对阅读的热望实在是不过分的。这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阅读运动,山河依旧,百废待兴,精神世界愈加活泼,阅读的领域也快速扩大。除了文学,人们还迫切需要用各种新知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获得机会,改变命运。正所谓开卷有益。“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在20世纪80年代亦有重演。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当年是煤矿工人,他就是在挖煤的间隙,在阴潮、黑暗的巷道里,借着安全帽上的矿灯,苦读了上百本中外名著。也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学生,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夜夜超负荷阅读,造成终生眼疾。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到乡村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劳动之余,倚靠着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那些大书陪伴他度过了沉闷的青春期。问他当时为什么读它们,他只说是因为喜欢。今天想来,类似上述的阅读实在是一种诚朴的热爱。热爱着,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

在这里讲述20世纪80年代,并非因为那特殊的历史背景给了中国作家一种空前的却并不牢靠的特殊地位,我回忆的是整个社会对待阅读的那份诚恳和郑重,以及带有几分纯真的激情。那个年代的阅读,饱含着重量,它光明正大,来势猛烈,因此这重量甚至是有声音的,它铿锵作响,使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品质有了某种异乎寻常的嘹亮音色。这音色沉淀在我们的文化中,缭绕不绝,至今还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同志们都知道,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家协会也派出干部去挂职,投入脱贫攻坚工作。我的一个年轻同事,被派到甘肃临潭县池沟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回来告诉我,报到的当天就去了村里的小学。三层楼的小学是山上的村民搬迁至山下时一并修建的。在如此贫困的地方能有一所崭新敞亮的学校,实属珍贵。但是作为图书室的房间却空荡荡的,仅有几摞旧书堆在墙角,适合小孩子阅读的很少。他萌生了要给孩子们建一个像模像样的图书室的想法。他与中华文学基金会联系,根据小学生的需求精心挑选了一批图书,当孩子们看到图书时一下子沸腾了。陶行知先生说:“乡村教育是立国之大本。”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来说,阅读,或者说书籍,本身就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阅读,使我们有机会通晓知识,振作精神,完善人格,发展自我。正是深知这一点,这位第一书记向文学界喊话,发起了助学活动。一批批书的包裹和一批批作家陆续来到大山深处。作家们为十所村小学、幼儿园创建、完善了图书室,还为周边六个村子建了农家书屋。这些工作或许是微小的,但却让我看到,那些图书宛如一点点火光,照亮了那些村子。若干年后,当这些孩子们走出乡村,用自己的所学建设乡村、报效国家的时候,会不会想起那个时刻,那个心灵被图书照亮,前路清晰的时刻。有学者曾经这样说:一个民族对文学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这里我想说,一个民族对阅读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我甚至想说,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是不是也有阅读潜在的功劳?

这里我想起了我们熟悉的作家马烽,不久前我们纪念了他的百年诞辰。1945年,年轻的马烽和西戎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吕梁英雄传》,那些日子里,乡村里识字的人拿着报纸走过田间地头,不识字的老乡围在他们身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报纸上最新的精彩故事。有时,乡亲们会簇拥着马烽,追问小说

后续的情节直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这是一部抗日的传奇、民族的史诗,但对乡亲们来说,这写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能够从中认出自己,由此体认生活的意义,增强战斗的信心,唤起的是最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怀。

另一位著名现代诗人田间,抗战期间在延安创作的一首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简洁明快地呐喊出中国人不愿做奴隶的反抗精神。诗句简单、直白,却极具震撼力,至今让我难忘: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与这些揭露日本侵略罪行、鼓舞人民斗志的街头诗同时出现的还有“枪杆子诗”,即诗人们把短诗抄写下来贴在战士的枪托上,鼓舞士气。我曾读到许多当年的战士的回忆文章,讲到他们是如何读着枪杆子诗、昂起中国人不屈的头颅,奋起抗击侵略者。当年阅读这些诗句的战士和百姓,并非想到将来要做诗人,但由这种阅读激发出的中国人民精神深处热爱和平、坚韧顽强、不屈向上的气概弥足珍贵。至此我们也更加理解为何闻一多把田间称作“时代的鼓手”。

说到这里,我想定义一下我所说的阅读。我谈的是阅读,而不仅仅是“看书”。这不单纯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尽管,在网络时代,在网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和笔逊位于光和电、机器的规则代替着汉字的规范、数字的操作颠覆了铅字的权威、“输入”代替着书写的潮流中,在“拇指文化”无限深入人群的今天,在消费的欲望热烈拥抱大众的背景下,“读”和“看”的界限似乎日渐模糊起来。技术的战车把新媒介——数码技术送进人间,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代着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但是,我更钟情于阅读。我总觉得,“看”代替了“读”,损失的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阅读是有重量的。它意味着专注、深度和付出。阅读不是被动的无所作为,恰恰相

反,它召唤全身心的投入。

阅读的欢愉之美

如前所说,阅读是有重量的精神运动,这重量让我们对阅读的重要毫不怀疑。但当我们凝神阅读那重的一面时,或许也不该忽略阅读的“轻”,这“轻”可能包括了看似无用的并非刻意的阅读。

选择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其实图书城是最“打击”写作者的地方。迈进图书大楼,铺天盖地全是书,现在网购也十分方便,书海已经茫茫。市场销售最好的书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实用。人们仿佛更愿意读那些“有用”或立刻有用的书。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据说,当年有人问季老在研究什么,他说研究东方文学。又问:您这样大年纪,研究东方文学有什么用呢?季老回答说,世上有很多的学问,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学问是你应该知道的。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阅读中,阅读文学作品似乎是最无用的一种,尤其在今天。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文学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

我留心过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到的他曾经阅读的书。在陕北的七年,他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读了莎翁一系列悲、喜剧剧本。他说,“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提到海明威,他说,“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他说,他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我们都能看出来,文艺,特别是文学,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阅读谱系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每每谈起,他都如数家珍。

对我来说,文学意味着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在20世纪70年代,我读到一部尚未卖掉、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带给我隐秘的欢乐。

那时让我难忘的,还有《聊斋志异》。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她们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会笑的约束和规矩,她们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聊斋志异》不仅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在世界短篇小说之林也有一席之地。你从中能读出中国人独特的幽默、智慧和超拔想象力。我要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从那时起,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

康成等等。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品貌各异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我并不指望这样的阅读立即对学业、职业生效,但这看似无用的轻盈的阅读其价值恰在于阅读心境的解放,和由此而来的身心放松的快乐。这里的“轻”不是轻浮,一切都会留下痕迹,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某些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的必须,你的气质在变化,你的人格在完善,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作家这个身份,我更在意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读者。甚至,我可以说,几乎所有作家都经由读者这一桥梁才能抵达。而每一个读者,当他拿起笔来,想要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明天的作家。正是在不间断地阅读过程中,我更加确信文学的价值。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学?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要读诗和小说?也许那是因为文学能够呼唤出潜伏在你心中诸多你所并不深知的情绪,从而激起你多样的思想或某些隐秘的美感。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关于经典和当代

有时我会被问到,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今天这个物质十分丰裕的时代,即使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阅读中去,终其一生,究竟能读多少书呢。我想,可能数字也是非常有限的吧。正像有人说的:选书好比选朋友。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

无书可读,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

对于我来说,一个答案是读经典。美国耶鲁大学有位叫哈罗德·布鲁姆的学者,他曾经就谈起过我们需要经典的原因。他说,“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从荷马到弗洛伊德、卡夫卡及贝克特,经历了近3000年的旅程。但丁、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及托尔斯泰是这一旅程所必经的深广港口,每一位作家都足够我们以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实际的难题在于每次广泛的一读再读都要排除掉一些东西。于是,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这也是许多人所认可的。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中国影响很大。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为什么读经典》的文章,里面提出了许多有趣而不乏真知灼见的观点。譬如,他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看,在这一点上,他与布鲁姆殊途同归。重读,意味着被归为经典的书是禁得起一读再读的,甚至每一遍阅读都有与人生经验相匹配的发现,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它的意义是如此深邃丰富,永远不会耗尽它所要向读者讲述的一切。

经典代表本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是普遍性的,具有与时间抗衡的力量。中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就是阅读经典的教育。当小小孩童念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的时候,我总是被深深地打动。这样一轮明月,它的清辉,洒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上,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在唐诗宋词里浸润过的人,心灵会更丰富。它让我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并在对话的过程中,提升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还有《红楼梦》,这部代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几乎是一本无所不包的书,红学家吴世昌曾经用一句诗来评价它:“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这大概就是文学经典的力量吧。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

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

读什么书,另外一个答案,我想还是要读一读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有朋友要说,在这个亿万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在这个现实似乎更加五光十色、更富戏剧性的时代,我为什么还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当代文学?因为,当代文学是活生生的,是以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为材料,以当代人的思想、情感为养分创造的。它来源于当下沸腾的、火热的生活,但又是在一个更高的尺度上,以一个整体性的视角看人、看事、看待时代和社会。正所谓,我们热爱生活,更爱被创造过的生活。疫情以来,大家共同的强烈感受是:一方面,人们好像觉得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一切想法都在摇摇晃晃中,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又都很坚持自己的想法,个个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似乎谁也不能说服谁。阅读当代文学,意味着我们有机会闯入他人的心灵世界,去打破固有的、僵化的认识,体味和思索他人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是有这种超越性的力量的。比如,当某个短视频在社交网站上流行的时候,人们想到的是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认为这部小说以更精妙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和生命的认识;比如,当人们纷纷感慨“未来已来”时,刘慈欣已经构建了雄浑阔大的宇宙图景,并投射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再比如,今年年初,感动了许多人的电视剧《人世间》,就改编自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人世间》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一年内发行16万套,同名电视剧热播后,小说再次热销,据中国青年出版社消息,今年上半年即发行70万套,成功实现了从专业化“文学阅读”向广泛社会阅读的效应转化。

又如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的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同年12月编剧龙平平又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目前该书发行突破8万册,已成畅销书。据京东

图书2022年中总榜统计,上榜的30种图书中,文学图书类占9个席位,并垄断了金、银、铜榜,由此可见其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观众和读者为什么在看完这些影视作品后还会再去买书来读呢?我想,读者是愿意通过阅读来寻找活在文字里的人物形象,来感受文学叙述本身的情感和魅力。我举了长篇小说的例子,事实上,当代作家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都有毫不逊色于世界文学的成绩。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作家协会正在评选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我相信,评选出来的作品会为我们理解生活、认识世界打开新的视野。同时,读者的信任也不断提醒我和我的同行们,必须始终葆有对文学的敬畏。我们相信,文学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如此,文学才能成为人类在认识自我的追寻中富有价值的宝藏。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水引入当代,如何以健康、向上、精湛、有力的作品凝聚人心,激发全体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蓬勃伟力,是中国作家、艺术家正在实践的重大课题。

有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假如人类的平均寿命以小时来计算,以长寿者为例,大约是65万个小时左右。《论语》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啊,时光是挽留不住的。但是,当我们有能力亲近阅读、亲近世界上所有的好书的时候,也许我们内心将产生创造时光的力量,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而双倍地延长。让我们相信,在每一时刻都有不可计数的信息沿着光纤飞奔的当今世界,阅读依旧没有成为人类颓败的嗜好;让我们共同赞美和热爱阅读,敬仰那些不断擦亮我们心灵的智慧之书,它会使精神欢愉,使灵魂有光,使天地温暖,使生命芬芳。

(本文为铁凝同志在2022年8月24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学习讲座时的讲稿)

(人民政协报 2022-08-29)